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4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7)

#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张国俊

(华南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权力话语;文革时期;文学翻译;潜在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4-0099-05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它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历时十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文学翻译当然在此之列。在经历了晚清时期的兴盛、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发展之后,文学翻译在六十年代起已经开始出现颓势,文革的到来更使其跌入低谷。文革十年间,从事外语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被扣上"崇洋媚外"、"兜售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反动权威"等帽子,被迫住"牛棚",进行"思想改造"。许多翻译家,如老舍、傅雷、丰子恺、萧珊、郭大力、查良铮(穆旦)、汝龙等均受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倍受摧残。许多翻译工作被迫中止,翻译机构如翻译工作者学会停止活动,翻译出版物《翻译通报》、《译文》等均被停刊。翻译研究领域更是荒芜一片。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表现到了极致。

目前译界对文革时期的翻译研究不多,且多停留于史实的简单叙述,如靳彪和赵秀明的《"文革"十年间的中国翻译界》和马士奎的的《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简要介绍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情况。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化,而从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 一、理论简介

### (一)权力话语理论

福柯首次将话语(Discourse)与权力(Power)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福柯所说的"权力"不是一个具体和狭义的概念,而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其中有有形的,即显形的权力,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等;也有无形的,即隐性的权力,如历史、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支配和左右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任何

**收稿日期**:2008-06-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07JC740004)

**作者简介**:张国俊(1981—),女,河南信阳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与外语教学.

人都是权力关系中不可分割的要素,无法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这个网络中,真理和知识都成为权力的表现形式。与他的权力理论密切相关的是他的话语理论。福柯的"话语"是建立在对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的批判之上的。他在《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这两本著作中建构了话语的概念。福柯所谓的"话语"不是语言学中的话语概念,而是浸透着意识形态的言语或文本,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控制和驾驭着其成员的思维和行动。需要说明的是,"话语"这个术语在福柯的著作里用法非常复杂,这只是其常见的涵义。

福柯认为,人文科学只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它只能是某一时期的人文科学,是这一时期控制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控制的载体。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它自始自终都是受着各种权力话语左右和操控下的行为[1]。

**(二)意识形态因素说**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早已引起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的重视,然而正式提出要认真探讨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影响翻译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个是诗学)的是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对这两大因素作了系统的描述。勒菲弗尔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以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内的其他系统的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所谓的"专业人士"(the professionals),包括批评家、评论者、教师、译者等。外因则是"赞助人"(patronage),指那些拥有足以促进或窒息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权力"的人和机构,他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商,以至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赞助人通常感兴趣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是诗学。因而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要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赞助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翻译过程进行干预,熟知赞助人意识形态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的在他们认为允许的范围内操纵他们的话语权力和技巧。

勒菲弗尔所说的"权力"正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他引用福柯的话说:使权力牢不可破、被人接受的就是这样事实: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对我们说不的压力,而且还超越并产生事物,引发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2]。也就是说,勒菲弗尔赞同福柯所说的权力不仅仅是消极的毁灭性的力量,同时更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

勒菲弗尔的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将翻译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然而其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之一是他没有为其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意识形态"下明确且严密的定义。早期勒菲弗尔简单地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世界观"。他同时也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定义的"围绕在某种程度上与整个社会和历史生活的中心权力架构的维持和质问相关的利益斗争的一套话语"[3]。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他对弗·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的意识形态定义表示赞同,即指示我们行动的形式、惯例和信仰。意识形态又被理解为"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能被允许是什么样的主导性观念"。在他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他又将意识形态描述为"由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里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观点和态度构成的观念框架"[4]。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本文沿用勒菲弗尔后期对意识形态的定义。

## 二、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如前所述,外国文学翻译在文革期间遭到极大破坏,成果寥寥,然而客观地说也并非一片空

白。当权者从“斗争”的角度出发，也给予了翻译一定程度的重视，使其服务于同期的政治使命。只不过这种活动完全是在权力话语的操控下进行的。从翻译题材的选定、译者的遴选和组织到对译作的阐释和译本的发行，翻译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了这一点。

**（一）翻译题材的选择**

文革时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与当时中国的政治需要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对友好的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作品尤其是当代作品的翻译成为主流，其中有越南的《运枪记》、《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巴拿的游击队》、《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选》、老挝的《生活的道路》和《老挝短篇小说集》、《柬埔寨通讯集》、《莫桑比克战斗诗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阿尔巴尼亚的《教师》、《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阿里果诗选》和《火焰》、朝鲜的《袭击》、《朝鲜短篇小说选》、《朝鲜诗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只有被认为是“进步”和“革命”的才有机会得到译介，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蟹工船》和《在外地主》，法国作品《鲍狄埃诗选》和《诸神渴了》等。曾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占重要地位的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而陷入停顿，直到 1972 年底才开始陆续出版了部分旧作，如高尔基的《人间》、《母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文革后期在上海创办了专门译介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内部刊物《摘译》，译介了不少苏联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批判的依据。《摘译》编者在《答读者——关于〈摘译〉的编译方针》中明确表示：《摘译》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艺揭示苏、美、日等国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为反帝和批判资产阶级提供材料，所发表的作品主要是根据这个原则选定的[5]169。

**（二）译作的出版发行**

除公开发行上述作品外，为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文革期间还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一些翻译作品作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面材料，供一定级别的干部和研究人员参考。当时出版的内部译作中以苏联作品居多，如《人世间》、《你到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他们为祖国而战》、《白轮船》、《苏修短篇小说集》、《热的雪》、《德尔苏·乌扎拉》、《淘金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核潜艇闻警出动》、《海浪上的花圈》、《火箭轰鸣》、《蓝色的闪电》、《夜晚记事》等。这些作品有的赞颂了苏联的军事扩张，有的表现了反华倾向，有的反映了苏联当代的社会生活。日本文学在文革期间也内部发行了多部作品，如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丰饶之海》四部曲之《天人五衰》、《晓寺》、《奔马》、《春雪》、五味川纯平的《虚构的大义——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小松左京的《日本的沉没》、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还有《沙器》、《望乡》、日本共产党员西野辰吉的短篇小说《晨霜路上》、《美日混血儿》、《不下蛋》、《C 镇记事》等。内部发行的还有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作品，如《乐观者的女儿》、《战争风云》、《帝国主义必败》等。

**（三）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

文革时期的翻译工作是在高度组织化的状态下进行的，选材有严格的规范，同时译者必须遵从某些权力人物和机构的监管，他们无权选择作品，只是受命于人，将文学翻译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做。许多翻译家翻译了很多他们自己并不喜爱的作品，而对自己喜爱的作品则不能随心所欲地翻译。翻译家方平在回忆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时无不心酸地说，那时候他翻译莎士比亚都是偷偷摸摸的，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小媳妇夜半偷会情人一样紧张忐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它用火和剑，强制你按照它的政治调子去思想，彻底剥夺了属于你个人的思维空间。”[6] 这一时期集体翻译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一部作品的翻译通常由多人合作完成，译本也多以集体的名义署名，还有些是匿名出版。集体翻译并非一无是处，但也充分显示了翻译活动的非个人性，表现了社会权力话语对个人权力话语的控制。

**(四)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

编译者对原文的阐释不仅表现在译文的正文中,同时也表现在序跋等周边文本中。文革时期政治化翻译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都以“前言”或“按语”等形式附上编译者的导读文章,引导读者作“正确的”政治化导读,以免产生“误解”。当时翻译出版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的出版前言就指出这部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并点明翻译该小说的意义在于让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让读者在善与恶的背后看到“苏修社会的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暴露了苏修假马克思主义,真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被认为是“内容反动、艺术趣味低级、极其拙劣”的作品,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给批判肖洛霍夫时提供一点材料”[7]。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让位于其政治利用价值,甚至被后者粗暴地掩盖了。这些导读也同时表达了译者的政治立场,是译者避免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自我保护翻译策略,从侧面反映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之一所受的控制。

## 三、译者个人话语微弱而顽强的表达

文革时期社会主流权力话语操控着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充分显露出上层建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同时也使翻译成为巩固和传播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和话语载体。然而,正如福柯在描述权力和话语的关系时所尖锐地指出的,有权力必然有反抗,有中心权力话语的存在,也有边缘权力话语的存在。此二者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是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交错演化。个体在权力网络系统中一方面是社会权力控制的对象,是权力传播和扩张的载体,另一方面,个体权力有可能反叛并颠覆社会权力话语。这一点在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中同样有所体现。

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高压政策严重束缚了个体的张扬,但有一个历史事实不容忽略,那就是文革期间地下翻译或潜在翻译的存在。由于时代语境的限制,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公开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品来翻译并出版,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在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条件下坚持着自己的喜好和审美追求,暗地里翻译一些符合自己审美取向的作品。如季羡林从1973年起偷偷翻译印度的《罗摩衍那》;巴金从1974年起开始悄悄翻译《往事与随想》;穆旦在1972年后开始翻译艾略特、奥登、叶芝等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格格不入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些翻译家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译作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但他们还是凭着坚强的信念坚持了自己的工作。

潜在翻译表达了译者的独立意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大一统局面的失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优秀的翻译家们找到了相对于主流话语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为新时代文学翻译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准备。

## 四、结语

雨果(Victor Hugo)曾尖锐地指出:“当你为一个国家提供翻译作品时,这个国家几乎肯定会把这翻译视作针对自己的暴力的行为。”[8]翻译意味着两种文化的交流,也可能意味着对译入语系统的破坏与颠覆。然而强硬的上层建筑与赞助人会运用自己的权力话语操纵翻译取材及译者的翻译实践,借翻译为巩固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是极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行为[5]169。社会权力话语控制着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同期文学翻译事业的停滞不前。然而部分潜在翻译的存在犹如黑暗中的火花。这种个人话语的表达在特殊的年代里更显珍贵。文革时期的翻译成果虽然不多,但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回顾这一时期的翻译我们

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本质：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 吕　俊.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07.
[2]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5.
[3]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140.
[4] LEFEVERE A.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Some Aneids in English [M]// Bassnett, Susan&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48.
[5]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6] 许　钧.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0.
[7] 马士奎. 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2003，(3).
[8] HUGO VICTOR. 1865. "Extract from the preface he wrote for the Shakespeare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y his son, Francois-Hugo" in Lefevere, A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2：18.

# Power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ZHANG Gu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based on Michael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discourse and Andre Lefevere's theory of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and historical facts reveals that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 and translators were to a great extent manipulated by the mainstream power discourse and ideology, and latent translation as a way to express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ranslation is not so innocent as it cannot free from ideological influence.

**Key Words**: power discourse; ideology;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latent translation